

现代本科教育与英国古典大学传统*

何 毅

摘 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发展,本科教育存在的弊端变得日益突出。英国古典大学本科教育的成功得到世界公认,向英国古典大学传统学习,要加强本科教育的根基地位,弘扬通识教育的传统,重建融洽的师生关系,珍视大学文化传统,在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基础上重建我国的大学本科教育。

关键词:本科教育;古典大学;住宿学院;通识教育

大学本科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对本科教育督促和监管的制度、条例也越来越健全,特别是最近教育部出台的《高教三十条》直指当前本科教育的弊端并从文本上提出了指导性和规范性意见。然而,这些制度、条例并未完全保障本科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教师怨声载道的“导火索”。因此,大学本科教育的质量提升亟需跳出我国高等教育的框架,突破管理思维的定势,向西方古典大学寻找大学本科教育的传统。

一、当前我国本科教育的现状

习惯上,我们把本科教育看成是介于研究生教育和专科教育之间的高等教育第二层次教育。事实上,本科教育是专科教育的加宽、加深,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类别上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学习年限的长短。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全面向苏联学习,形成了“专业对口”、“学以致用”的本科教育思想,致使“本科教育专科化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高等教育全面学习苏联还直接引发了本科教育“专业设置过窄、人文素质教育薄

弱、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偏死、培养模式单一”等突出问题。^①这些问题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发展变得愈益突出。本科教学改革的前提是改变本科教育观。在当前尤其要纠正本科教育是单纯的知识教育、本科教育是单纯的专业教育、本科教育是职业培训、本科教育是守成教育的错误观念。如果不能在以上问题上形成共识,本科教育改革将只会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形成本科教育改革的系统集成效应。

二、英国古典大学教育的传统

英国大学历史悠久,早在中世纪就有了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但是,从12世纪到19世纪初的600多年里,英格兰却只有这两所大学。之所以其他大学没有建立,不是因为缺乏经济实力和社会需求,而是因为大学传统。或者说“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现行政府的政策,而主要在于英国人对大学本质的看法,在于高等教育和社会大背景的关系。”^②英国高等教育因其传统性和稳定性,也由此享有“大学的历史博物馆”的美誉。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的两所大学更是因其深厚的大学传统和独特的组织形式而成为英

作者简介:何毅,男,湖北十堰人,温州大学高教所副研究员,温州大学步青学区党总支副书记、副主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管理(温州 325035)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我国内地高校住宿学院制改革的本土化实践研究:以五所高校为例”(编号:13YJC880026)及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课题“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视阈下的高校住宿学院制研究”(编号:2013N080)的研究成果。

国古典大学的典范。追溯两所大学的历史,可以发现以“牛桥”为代表的英国古典大学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一) 坚守保守渐进的组织变革方式

牛津创建于12世纪,剑桥创建于13世纪。两校从创建至今,任凭风云变幻,它们一直保持绝对的权威地位,高居英国大学金字塔的顶端。“牛桥”的这种超凡脱俗有其自身的原因。它们从创建之始就坚持通往教堂的宗教训练,也提供培养文化、文学、政治精英的普通教育——这种教育以古代语言、历史以及文学等古典人文教育为课程的核心内容,排斥世俗的专门的职业训练。这种传统当然得益于英国上流社会的支持。“牛桥”每一所学院的创办都与教会成员、皇室成员以及其他一些富有者的赞助有关。另外,它们还在英国社会享有独特的地位,既受到教会的庇护,也受到王室的庇护。“牛桥”的强势传统在18世纪以来工业革命的冲击下饱受争议。工业革命的重大发明创新不是来自大学内部而是来自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引起人们对“牛桥”保守性的质疑。在此背景下,试图建立一所“有用知识型”大学的伦敦大学应运而生,伦敦大学的缔造者回避“牛桥”传统转向英格兰以外的新的尤其是经过改革的大学学习,主张针对社会发展需要设置课程并主张理论联系实际,然而伦敦大学最终以演变为考试机构而妥协作罢。19世纪50年代起,工业革命的浪潮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加剧,在先进与保守、改革与守旧的冲突中,大批新型大学在英格兰北部及威尔士出现。城市大学的出现成为大学驻地城市工业研究的中心。二战的结束和英国的战时表现,使许多人开始认识到英国科技人才的缺乏,《罗宾斯报告》的出台推动了英国大学发展史上规模庞大的“新大学运动”。一批以崭新面貌出现的大学向英国大学“重文轻理”的传统决裂并建立起新的系科组织。此后,英国大学系统才初步形成。

从以上对英国大学系统生成的概述看,英国大学生态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尽管每一次的革新都是社会发展需求驱动的结果。但是,无论是工业革命、教育民主化运动还是世界大战后对科技人才的需求,都是在和以“牛桥”为代表的古典大学进行博弈

的过程中逐步推进的。阿什比说“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他认为“大学的进化就像有机体的进化,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小改革来完成的。大规模的变革往往会导致毁灭。大学的变革必须以固有的传统为基础。”^[3]抛开英国大学对传统的过于“顽固性”一面,这种貌似保守的大学制度建构方式却保障了大学持续不断的壮大与发展并保障了高质量的学术产出。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大学制度渐进发展之路很好地解决了传统与创新、继承与否定的关系,从而大学制度的现代化历程避免了因为激烈的冲突或剧烈的变革而可能导致的暂时停滞或断裂。^[4]这一点,恰好和法国大学的发展形成对比。

(二) 实行住宿学院的内部运作模式

住宿学院制是最能反映英国大学组织运作全貌的重要制度,也一直被“牛桥”所津津乐道。住宿学院结构有利于保持大学独立和自治的传统,各学院在交流与竞争中形成的学院精神是推动大学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内在动力,各学院中实行的导师制是最有效的教学手段之一,而学院内的所谓“学院式的生活”在塑造学生全面的文化气质方面的作用更是其它任何教学方式都无法替代的。

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回忆自己当年选择牛津的原因时坦言:“牛津大学对我还有一种吸引力,那就是它的学院制度,这种制度至今对我仍具吸引力。”^[5]著名的《罗宾斯报告》评价道:“高等教育的机关不仅仅是教学的场所,而是一个社会……牛津和剑桥虽然在学生和教师员额比例方面并不甚理想,而且大部分教师从事纯粹研究工作,但学生因考试而至不能毕业的比率经常较其他大学为低。这纵然原因不止一项但学院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贡献。”^[6]而金耀基先生更是称赞说:“学院制是牛、剑二校的特色与灵魂,讲牛剑而不谈学院就像莎翁的《哈姆雷特》中没有了丹麦王子。”^[7]由此可见住宿学院制对英国本科教育的影响。

从中世纪起,牛津和剑桥两校就认为设立大学是为了给教会和政府培养服务人员,也就是说对大学毕业生而言,具有教养比具有高深学识更为重要,大学的职责是实施博雅教育而不是专业训练。因此,住宿学院的教学过程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依

然注重学生个人和导师面对面的交流,注重陶冶价值观和训练思维方式而不注重罗列事实。这种教育理念的影响最集中地体现在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教育家约翰·纽曼的教育思想中。纽曼曾在牛津大学生活、工作二十余年,这一段经历在他的教育思想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纽曼的大学教育观在许多方面就是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办学理念的总结和论证。今天,我国内地也有超过70所高校正在探索各种形式的住宿学院制改革,包括西安交通大学、汕头大学、苏州大学等,尤其是复旦大学2012年开始在全校本科教育中推行住宿书院制而成为社会焦点。住宿学院对本科人才培养到底产生什么影响?能否将欧美高校的住宿学院制度在我国进行移植和推广?如何进行移植和推广?住宿学院的未来怎么发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决定着住宿学院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和纵深推进。但是,毫无疑问,对住宿学院这种人才培养模式的学习和借鉴反映出我国一部分高校开始注重从教育组织模式上探索本科人才培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我国当前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

(三)实行导师制的教学组织形式

导师制和住宿学院制是联系十分密切的教学制度。中世纪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对教学做出统一的管理。教学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讲座,一种是辩论。各学部根据本学科的需要规定学生听取讲座的数量。最初大学甚至没有专门授课的地方,讲座只能在附近的教堂或教师的住所甚至在街道、空地露天进行。住宿学院的建立,使教学活动中心发生转移,学院成为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教学方式也相应发生重大变化。在住宿学院,除辩论之外,公共讲座渐渐地被导师制所取代。导师制以本科生为中心,以教学为目标。导师的成绩不在于学术成果的多寡,而在于培养出了多少本科优等生。实际上,繁重的教学工作也让学院导师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用在学术研究上。但是,住宿学院以教学为中心的做法却最成功地体现了“牛桥”“造就一个人而不是撰写一本书”的教育目标。^[8]

导师制作为英国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古典大

学的传统教学组织模式,对英国大学制度形成和大学本科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当然,对于导师制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最主要的批评是认为导师过于关注学生的琐碎生活指导而导致教师质量的下降。然而赞美者也极力美化。如美国学者莱克斯纳指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本科生与导师之间确立的人际关系,尽管可能存在种种个人的局限性,却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教学关系。课堂教学的稀少,师生间每周的面谈,有时延伸至漫长假期的非正式关系,促使学生独立自主也使他直接受到教师的影响。”^[9]

导师制在英国发端,但是因其育人功能的强大也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我国近些年来也在积极呼吁建立导师制。因为无论是教师还是管理者都看到了高等教育扩招后教师教书与育人的失衡。英国“牛桥”的导师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们模仿的对象,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是简单地借鉴了导师制的外在形式,却缺乏与导师制配套的教育组织模式变革或制度保证。导师制在本科人才培养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古典大学具有深厚的精英教育传统。其突出表现就是:面向平民大众的“合适的”教育在英国主要是通过继续教育或其他形式的教育完成的,而精英教育却是大学的“偏好”。这种精英教育取向的大学教育传统为牛津、剑桥带来极大的学术声誉。无论是世界哪种版本的一流大学排行榜,牛津和剑桥都在一流大学之列并列前茅。单从诺贝尔奖获奖情况看,“牛桥”创校至今,英国共有100多人曾获得过这个奖励,其中36位出自牛津,63位出自剑桥,还有78位与剑桥密切相关。^[10]如果按人口平均数计算,获奖人次位居世界首位,总数仅次于美国。

三、英国古典大学传统对我国现代本科教育的启示

英国古典大学本科教育的成功得到世界公认。其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其坚守精英教育的价值取向是最为根本的原因。这个精英教育的价值取向符合大学教师对“大学意义”共同一致的理解。如果这种共同的认识强而有力,就形成一种强而有力的内在逻辑,而这种内在逻辑就由新的大学继承下去。

^[11] 因此,从短期来看,大学的近期利益与是否适应社会某一时期经济、政治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大学的长远发展却必须遵循大学的内在逻辑。对英国的大学而言,这个内在逻辑就是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英国古典大学本科教育的成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样本。我国当前的大学本科教育正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向英国古典大学教育汲取营养显得尤为迫切。

(一)本科教育要体现大学教育根基地位。英国大学教育的优势和特色在本科教育。无论是住宿学院还是导师制主要是针对本科生而言。把本科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基础是许多有见地的大学校长的共识。学者乔治·弗里斯在《巨型大学、理念及民主》中曾呼吁规模不断扩大的现代大学应彻底扭转大学为了其“研究使命”而贬低甚至无视本科生教学之价值的趋向,要认识到本科生教育过去是如何在事实上成为大学的“中心任务”或“突出任务”的,牛津大学的观念具有代表性并继续留存在“英美民众的心目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1986年6月9日在上海交大曾作过一次主题为《关于办好一所大学的几点意见》的演讲,他在谈到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时说到加州大学有一个优良传统,那就是鼓励著名教授给本科生上基础课。他说“我们学校规定,任何一位教一门研究生课程的教师,一定要教一门本科生课,而教基础课的,我们尽量安排最好的教授。许多诺贝尔奖金的得主,让他们教一年级的化学、物理。虽然有时候他们教学并不那么理想,但是没有关系,许多学生说,听过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教师的课,对他是很大的刺激。”^[12] 现在许多高校都明确要求教授要走上一线教学岗位,为本科生上课并且将其与教师业绩考核和教授分级挂钩。在客观上对本科教育确实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现在不少学校的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并没有转化为人才培养的自觉。而且在日益繁重的科研考核压力下,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的现实效应也大打折扣。更为严重的是科研导向的评价机制,使得大量的学者教授对本科教学缺乏兴趣。教学工作看似重要实际上成为当前大学本科教育的“软肋”。

(二)本科教育要弘扬通识教育的传统。通识教

育 (General Education) 一词源自拉丁语“Studium Generale”,即“来自各方的人一起参与学习”的意思,^[13]现在通常被翻译为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有关“自由教育”的思想和初步的课程设置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以后,经过纽曼等人的发展达到意义和理解上的极致。英国大学特别是牛津和剑桥具有自由教育的浓厚传统。在自由主义信奉者看来大学只应该保留教学的职能,通过自由教育发展学生的智力和道德,并且主张在学院和大学之间进行智力分工。因为他们认为实用技术的课程“与文明和价值所主要依赖的东西不一样,不是每一代所应传至下一代的财富的一个组成部分。”^[14] 因为坚守自由教育的传统,英国大学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激烈的辩论。

近些年来,自由教育在我国的大学也得到迅速发展,比较典型的是华中科技大学。该校在1999年《关于制订1999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就明确提出实施“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并详细指出,通识教育基础既包括自然科学基础,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既包括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传授,也包括基本能力和基本素质培养。在工科专业中,通识教育基础课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人文社科(含两课、文化素质教育)体育、外语、计算机、数学等,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以及经济、管理等。^[15] 近些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则是复旦大学。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提出以文理教育为核心,全面推进学分制建设。具体任务是通过课程结构调整,使学生在进校后相当长时间内可以不分专业学习。即使学生进校时有专业属性,但不影响他们改变专业。最终目标是经过五年左右时间完成学科大平台的构建,成立复旦学院,实现新生不分专业入学。入学后先进入复旦学院培养,接受基础的通才教育,然后再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专业。2012年复旦大学在经过数年的试点后正式在全校推行这一改革,全校新生都归入复旦学院,在本科一年级实行大平台的通识教育。与复旦大学具有同样想法并且在组织模式上进行革命性变革的还有西安交通大学和汕头大学等。他们的选择是成立书院,让其承担起除专业教学以外学

生课外教育的主要任务,试图为我国本科教学的通识人才培养探索一条新路。在高等教育日益走向大众化阶段的今天,一部分高校探索以通识教育为指向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图改变“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忽视、对人的生动活泼个性的忽视”等不正确的本科教育观,并以此扭转“本科教育变成知识教育、专业教育、就业教育”的不良倾向。这些教育组织模式的改革探索值得我们期待。

(三)本科教育要重建融洽的师生关系。英国的导师制为师生关系树立了一个最好的样本。加拿大作家斯蒂芬·利考克在《我见之牛津》一文中把牛津的成功归功于导师的作用,他说“学生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导师那里,或者不如说同导师一起学到的。”^[16]利考克的说法尽管有些夸大但是导师在学生成长中的作用却不容置疑。没有和谐良好的师生关系,要建设优质本科教育是难上加难。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通俗的说应该是教书育人的统一。教师不仅要教书更要育人,要把教书育人视为教师的天职。著名数学家、教育家苏步青先生在《谈谈教书育人》一文中曾说,“作为教师,从上台的那天起,思想上就要牢记着教书育人这条信念,并把它贯穿到自己的教学中去。”要“把教书育人作为己任,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多出人才,出好人才。”^[17]苏步青先生一生牢记这个信条,培养出谷超豪、李大潜等众多数学院士,形成了备受称道的“苏步青效应”。时至今日,不少教师把课堂教学之外的育人作为负担,教书与育人完全脱节,成为影响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症结。

(四)本科教育要珍视大学文化传统。大学被视为中世纪留下的最为珍贵的遗产之一。而大学之所以能够绵延不亘数百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成为其灵魂。它们或表现在大学的建筑中或表现在节日传统上,甚至表现在穿着服饰上。“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每晚九点零五分,学院钟楼上的大钟就要敲101下,这是因为当年这个学院只有101个学生,钟声是催他们赶快返校。每年5月1日是迎接春天来临的节日,举行舞会后,穿燕尾礼服的男生和着长裙的女生照例要来到穆特林学院的桥

下,坐在平底木船上听塔楼里歌咏队的歌声直到天明。”^[18]而剑桥大学的五月舞会“正式而隆重,男生要穿黑色礼服,女生穿白色长裙,往往是通宵跳舞。舞会结束后,男生要撑平底船送女伴回到学院。也有的人兴犹未尽,还将平底船一直撑到剑桥市西南角的格兰特契斯特镇,去那吃早餐,这也是一个传统。”^[19]又例如,剑桥古老的三一学院至今依然保留着许多繁琐的传统习俗,如每天晚餐前全体师生都必须一起祷告。英国牛津和剑桥每年的毕业典礼和开学仪式盛大隆重,对参加仪式的人员而言,学袍、语言及使用的器物都保留着中世纪大学的传统。这些传统的存在,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文化、艺术的熏陶,良好的涵养和优雅的气质慢慢形成。

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最为基础的一个阶段,对于青年学生的价值观、气质、修养、行为养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大学文化传统是大学教育的精神源泉。今天的本科教育偏向教育的器物层面,追捧学习的“短平快”,忽视了对大学文化传统的弘扬。事实上,除欧洲古典大学具有深厚文化传统之外,我国古代的书院等教育组织同样具有十分优良的文化传统。我国现代大学自上世纪初模仿西方大学以来“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但是在长达百余年的办学实践中,却始终没有解决好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断裂传统直接导致现代大学精神的缺失,成为大学教育不可承受之重。本科教育怎样珍惜文化传统,怎样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今天大学教育需要正视的重要问题。

英国的大学教育具有鲜明特色,也体现深厚的英伦文化。英国大学传统的形成经过了数百年的历史积淀,并已融入到了英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英国大学的传统对英国大学制度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同时也是英国大学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了解英国的大学传统不是要完全照搬并进行直接移植,而且英国大学传统也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英国大学传统的了解得到对我国当前正在推进的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启示并能够取其所长避其所短,从而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我国的大学本科教育。

参考文献:

- [1] 别敦荣, 黄爱华. 重建大学本科教学[J]. 教育发展研究, 2001(5):54-57.
- [2] [美] 马丁-特罗. 英美高等教育政策比较[J].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 2000(4):16.
- [3] [11] [英] 阿什比, 滕大春、滕大生译.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没]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20、114.
- [4] 高桂娟. 现代大学制度演进的文化逻辑[M].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7:129.
- [5] 韩薇主编. 牛津深呼吸[M].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71.
- [6] 中国教育学会主编. 高等教育研究[M]. 正中书局, 1976年版:91.
- [7] 金耀基. 剑桥与海德堡—欧游语丝[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年:94.
- [8] 张建政. 牛津、剑桥大学学院制研究:1249年-1636年[D]. 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年, 36.
- [9] [美]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徐辉、陈晓菲译. 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 [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240.
- [10] 连淑能. 牛津剑桥之谜[J]. 外国高等教育资料, 1999(4):45.
- [12] 睢依凡. 学府之魂—中外著名大学校长教育理念[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262.
- [13] 张灿辉. 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概览. 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 序言[A]. 2005:2-3.
- [14] 徐辉. 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论大学和工业的关系[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0:38.
- [15] 华中理工大学教务处. 构建 21 世纪初人才培养新模式[Z]. 华中理工大学 99 级本科人才培养计划:15-17.
- [16] [18] 裘克安. 牛津大学[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6:86、98.
- [17] 苏步青. 苏步青文选[M]. 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112-113.
- [19] 梁丽娟. 剑桥大学[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149.

(责任编辑:王伟宜)

Moder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Tradition of British Classical University

He Yi

Abstract: Along with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from elite to mass stage, the drawbacks existing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successfu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f British classical university has been recognized in the world. If we want to learn the traditional British classical university,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tatus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promote the tradition of liberal education, reconstruct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cherish the tradition of university culture and rebuil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fus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

Keyword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classical university, residential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